

FUDAN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4

复旦哲学评论

◎ 第4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FUDAN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4

复旦哲学评论

第四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哲学评论. 第4辑/吴新文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08-08000-3

I. 复... II. 吴... III. 哲学—文集 IV. B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3133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美术编辑 杨德鸿

装帧设计 杨钟玮·槐树设计

复旦哲学评论

(第4辑)

本辑执行主编 吴新文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7.75 插页 1 字数 299,000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8000-3/B·668

定价 32.00元

学 术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雷泉	邓安庆	冯 平	孙承叔
刘放桐	李天纲	吴晓明	余源培
汪堂家	张庆熊	张汝伦	陈学明
杨泽波	俞吾金	黄颂杰	

本辑执行主编 吴新文 吴 猛

目 录

论文

论哲学的当代使命 /傅青哲 1

哲学教育与当代社会 /黄颂杰 13

二程的新儒家的政治哲学：礼之政治学、心理学和形上学的层面 /黄 勇 19

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一个现象学的考察 /吴 猛 39

“第三条道路”政治哲学的标本

——从福利国家到“社会投资国家” /肖 巍 53

对于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政治哲学进路的初步探索 /徐英瑾 65

苏格拉底与人道论之始 /梁家荣 86

对休谟关于意志与直接情感理论的解读 /陈晓曦 110

约纳斯的责任伦理学：论证与应用的问题 /罗亚玲 122

伦理的生态维度——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革命述评 /杨英姿 138

卡尔·拉纳的上帝经验论及其对传统的上帝存在证明的超越 /王新生 151

佛教唯识宗“烦恼”(kleśa)的基本性质：

心理学概念与伦理学概念之辨 /刘宇光 164

“鸢飞鱼跃”论 /刘康德 204

真之耦合与超越 /侯 纯 220

译文

汉斯·约纳斯——著作、洞见和现实性 /[德]底特利希·伯勒尔著 罗亚玲译 234

短论

哲学之思的任务 /王金林 257

哲学何为？ /汪堂家 259

哲学必须回应时代的呼声 /王志伟 261

■《复旦哲学评论》第四辑

哲学在21 世纪的使命：先知式的批判 /刘 平 264

哲学要回归伦理性的生活世界 /邓安庆 268

哲学反思力与科技创新力 /徐英瑾 271

编后记 /274

论哲学的当代使命

傅青哲

〔内容提要〕 在中国当代哲学继往开来的今天,本文对中国当代哲学的历史遗产、当前状况和未来任务做了一番清楚全面的梳理盘点,并在古今中西的问题框架中界定了哲学的当代使命。中国当代哲学只有基于世界历史视野,从现实生活出发,古为今用,会通中西,才能担负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历史责任,并对人类历史做出更大的理论贡献。

五十多年前,复旦大学与国内其他几大兄弟院校同时成立了哲学系。这标志着中国哲学进入了又一轮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如果我们把从 19、20 世纪之交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哲学称为“现代中国哲学”的话,那么 50 年以来的中国哲学可以算作“当代中国哲学”。20 世纪上半叶是中华民族在社会革命与民族解放道路上踔厉风发、奋勇前进的时代。之后的五十余年则是中国社会探索建设道路、产生深刻变革的年代。21 世纪以来,我国更是进入了一个伟大实践成就呼唤伟大理论创新的时代。

那么,中国当代哲学界是否已经准备好承担这样的职责与使命了呢?在纪念中国当代哲学开创时期的今天,哲学界有必要对历史的遗产、当前的状况和未来的任务作一番清楚的梳理盘点,做到目标明确、轻装上路,自信地担负起时代和人民交给自己的历史责任。毕竟,对未来的规划才是对过去的最好纪念。

中文的“哲学”一词是西学东渐的产物。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文学界逐渐接受了用这个引自东瀛的

汉语词来翻译希腊词 *philosophia* 及其在各西方语文中的对应概念。与此相应,哲学也就作为一种新的学问门类确立了下来。新学科当然从属于一种新的学科系统与教育制度。哲学学科建立的背后,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知识体系在中国全面确立主宰地位的新陈代谢过程。这一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自新自强、摸索着走出自己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变革进程。就中国历史而言,哲学的建立不折不扣是现代化的伴生现象。现代化是对旧文化旧制度的革命,哲学是对旧时代的精神支柱——儒教与经学的革命。哲学与现代化休戚与共,同享荣耀。现代的力量、制度、历史与文化——一言以蔽之,现代社会的基本理想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脉络中被争辩、解释、改造与实行的全部复杂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哲学学科建立的基本问题处境。总之,正如哲学史家所洞察到的,影响中国现代哲学产生与发展的首要问题就是所谓“古今中西之争”。^①

在中华文明现代化的宏大进程中,中国年轻的哲学学科没有辜负时代的召唤,产生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和杰出人物。从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哲学在以下几个方面开拓了道路、影响了历史。

首先,中国现代哲学比较完备地建立了自己的学科领域、问题意识与研究规范。这与现代学术体系的全面建立基本同步。中国现代哲学在现代学术体系、教育制度与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也是适宜的,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基本设想。这一条贡献由于不能系于具体的思潮或人物之下,比较容易被忽视。然而这条贡献确是关键性的。它不是具体哪个哲学流派的胜利,而是哲学本身的胜利。哲学所引领的现代知识体系完全胜利,这也就意味着经学所引领的传统学术体系完全崩溃——传统学术门类即使存在,也只能以片断的形式被整合到现代体系中去。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能以个人之力作出这样巨大的贡献。

其次,在时代风云、社会实践、传统思想以及哲学学科内问题意识的激荡引领之下,中国现代哲学在建立真正的哲学体系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产生了若干独自创建体系的哲学家。按照哲学史的概括,这主要包括了金岳霖与冯友兰的新理学、梁漱溟与熊十力的新心学,特别还有作为哲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等等。^②

再次,中国现代哲学的另一大贡献,就是以哲学的问题意识重新整理、叙述中

^① 参见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绪论第一节。

^② 参见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史概括,也见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正文终章。

国思想史,将散见在以四部之学为基本脉络的中国学术史中的诸多哲学要素提炼出来,前无古人地梳理了中国形而上学、宇宙论、伦理学、政治哲学以及认识论等思想传统。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胡适、冯友兰等各自的中国哲学史著述。在某种意义上,这方面工作的国内外影响甚至比某些哲学体系的构造更为深远。

另外,哲学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也有不俗的成就。例如蔡元培的伦理学研究、沈有鼎的逻辑学研究,朱光潜的美学研究,都或有开辟之功,或有中兴之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现代中国哲学对社会变革、文化运动与政治革命的参与、回应与引领。现代中国哲学在反省传统文化、激发社会思潮、建立或反思意识形态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贡献是如此的显著,与现代哲学的构建与发展是如此的不可分割,以至于最重要的有关回顾,要么以近 3/4 的篇幅阐述社会革命与文化运动的理论,^①要么径直将“革命”作为哲学史叙述的主线。^②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无疑是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运用和发展。

二

上文所概括的这些贡献,是前人留给当代中国哲学的丰富遗产,也是影响当代哲学基本格局的最重要因素。它既是当代哲学有所推进的基础,又是衡量后者的比较合理的参照尺度之一。不了解当代中国哲学的现状,那就谈不上自觉的发展与创新。而要对当代中国哲学的特点、状况与趋势作出比较恰当的估计,一个最可行的做法就是拿它同现代中国哲学作全方位的对照,就像可以通过与祖父、父亲的对照,来确定一个继承人的贤愚不肖那样。

首先,在学科建制方面,当代中国哲学在前人贡献的基础上,丰富完善了哲学学科下属的各专门领域。专业更加细化,专业之间的分工更加符合现代学科的特点。随着旧式教育的彻底终结,经学与儒教对哲学建设的阻挠已经根本不存在了。另外应该指出,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我国哲学学科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显示了不同的特点,例如高校院系调整之前比较重视哲学史与逻辑学;新中国建立后一直比较重视

①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又比较重视现代西方哲学的译介研究等等。

其次,哲学史研究不断繁荣,整体水准超过以往。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哲学史研究的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无论通史类的著述,还是对一些重要人物的深入研究,或者对冷僻课题的填补空白之作,都有超越前人的表现。20世纪50年代以来,除港台地区之外,中国现代哲学体系的构建工作基本停滞了,但哲学史的著述无论就水准还是数量而言都超过以往。其代表作有冯友兰、劳思光等的中国哲学史著述,以及更为信实全面的康德作品中译本等。当前中国的哲学史研究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特别关注对现代西方哲学以及当代西方新思潮新动态的研究;二是哲学史研究以不同程度促进了哲学原理研究或者一般哲学思潮的产生。例如,80年代的康德研究、90年代的海德格尔研究等都在哲学史学科范围之外发挥了重要影响。

最后,当代中国哲学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保持着更为密切的相互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研究社会被日益重视,科学技术哲学一度成为热点。同一时期,社会科学若干学科的重建也与哲学研究有关。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及文化哲学等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有所交叉的哲学领域中,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

历史现象总是辩证的。在肯定当代哲学研究繁荣现状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繁荣还不是辉煌,当代哲学研究不乏严重的弱点甚至致命的缺憾。与20世纪前半叶的哲学研究状况相比,当代中国哲学既没有出现可以名垂青史的大师级的哲学家,也未曾产生发挥深远社会影响的哲学体系或哲学思潮。战乱频仍、国家贫弱、思想专制的年代能够产生的成就,生活安定、国家富强、和平繁荣的年代何以无法超越?毋庸讳言,这里当然有文教政策、科研体制及社会心态等外在原因,但君子贵在责己,不迁怒,不诿过。没有出息的人才归咎环境、怨天尤人。我们应该深刻自省当前哲学研究的现状,找到症结,努力克服,作出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贡献。

当前中国哲学研究有如下四方面的不良倾向。其中有的倾向是中国特有的,有的则是当代世界哲学共有的,还有的甚至是现代哲学一般的问题。

首先,由于学科高度分化,“哲学”实际上已经消失在它众多的二级学科当中。我们只有哲学史、宗教学、美学、伦理学等各科“哲学专家”,而没有哲学家。哲学本是整全之学,哲学的精神与“学科”的旨趣是完全相反的。当学科的课题意识取代了哲学的问题意识之后,能够出现哲学家倒是咄咄怪事。哲学系可以说是各教研

室的集合,但哲学并不等于各二级学科的总和。哲学有它自成一体的问题。对这种问题缺乏敏锐的意识,哲学就不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只能源于对整个时代生活的敏感与反思。比照前人,这正是当代的哲学研究所比较缺乏的。

另一方面,就哲学研究而言,问题意识还必须与哲学特有的表达方式与研究道路结合起来。仅仅抓住问题还不够,还必须将它转化提升为真正的哲学问题。从这个角度检查,当代中国哲学界虽也出现了一些灵感的火花,但由于没有同哲学创新的概念形式结合起来,是无法产生真正的哲学体系的。在这一点上,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在哲学形式上的探索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其次,高度繁荣的哲学史研究一方面促进另一方面也阻碍了真正的哲学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哲学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重西方轻东方、重现代轻古代等浮躁倾向。这些倾向致使我们对世界哲学的理解流于轻率表面,更让我国哲学界部分沾染了求新务奇、不断追逐时髦思潮的不良风气。外国哲学自有其问题脉络,这些脉络与我国当代哲学面临的基本问题之间有复杂的联系,但更有深刻的差异。如果被他人的问题意识甚至时尚言论牵着鼻子走,结果只能是,要么生搬硬套,对本国思想史料作不贴切的概括裁剪,要么无的放矢,对本国现实问题作不合格的把握表达,进退失据,毫无主见,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哲学建树。如不切实纠正这种误把他乡当故乡的不良倾向,中国哲学界就会重蹈外国技术主宰本地劳力的低端制造业错误。

再次,中国当代哲学一直没有理顺同科学的关系。哲学曾一度被当作科学总和或者太上科学。目前人们也仍将哲学与社会科学相提并论。这种倾向的害处首先不在于问题意识,而在于对问题的表达与解决。哲学不仅要准确地抓住基本问题,而且还要以它自己的方式表达和解决基本问题。前者是对哲学的激发,后者才是对哲学的完成。如不清楚地意识到同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哲学就无法以真实的面目或合法的形态出现。

最后,当代哲学也没有完全厘清自己同意识形态、决策研究的关系。在古代社会与宗教纠缠,在现代社会与意识形态纠缠,这是哲学无可回避的现实任务。古代宗教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基本是紧张的,而启蒙运动以来逐渐成熟的现代意识形态则与现代哲学本身保持着积极关系。没有启蒙哲学,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是不会完成的。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建设与批判都发端于启蒙传统的内在整合。对于建构并丰富作为社会政治共识基础的意识形态而言,现代哲学流派之间的种种争论,由于其不可或缺的实践取向,都是积极而有成效的。古代哲学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现代哲学的基本旨趣则是“改造世界”,无非为“最好”方案不断论争而已。最终会有

一个抓住人群、不断发展因而战胜一切对手的学说为宗教批判之后的现代社会奠定真正的价值建设基础。处于“革命进程”中的现代中国哲学自觉而充分地展示了这一过程。意识形态是普遍的、论断式的、建立在自然规律与历史规律的基础之上的。一言以蔽之,意识形态是哲学式的,而决策则是具体的、诊断式的、建立在特定处境的特定趋势上的。真正合格的意识形态必须以完整的哲学体系为基础。唯其如此,服务于社会革命需要的现代中国哲学所争论的头等大事,就是历史观问题。^①相反革命胜利之后的当代哲学,虽有反思、建设意识形态的良好动机,由于不再追问客观、普遍的真正哲学问题,因而不保构建哲学体系的能力,遂注定无法完成重建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在实践方面只能将对策研究这样的实证科学任务留给自己。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当代哲学之所以大大落后于时代,没有表现出与时代相称的充沛活力,根本症结在于缺乏对哲学研究最高使命的基本自觉。如果不知道哲学应该不断以自己的方式做探本穷源式的天问,那么哲学研究怎么可能从各“二级学科”中从容独立而又有别于哲学史、社会科学以及对策研究呢?与外在取向的对象性知识形态不同,哲学是一种与自知自觉无法分割的知识或觉悟。科学只知其对象,而不自知其为科学。哲学必定自知其为哲学。而哲学要自知其为哲学,这首先要要求哲学必须知道自己的研究使命何在。

三

哲学究竟研究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一直纠缠着黑格尔体系瓦解之后的当代哲学。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20世纪20年代,那个世纪最伟大的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针对当代西方哲学遗忘自己根本使命的倾向说道:“存在才是哲学真正的和唯一的主题……哲学是关于存在的知识或者存在论。”^②

海德格尔的这个主张,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关于存在论或者说本体论的讨论在外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等研究领域因此一度格外活跃。然而,如果我们不那么健忘的话,对哲学根本问

^① 参见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绪论第二节。

^② 《海德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4卷,第15页。

题的类似提法,我国哲学界其实并不陌生。早在 1886 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即已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广为人知的教诲往往被教条主义地理解为,思维与物质世界(被等同于自然世界)的关系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仿佛预见到了这一典型的费尔巴哈式误解,恩格斯在同一著作的下文不远处提醒道:“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②作为这门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唯物主义无非就是按其本相而非幻想“理解现实世界”;^③而哲学这种“概念的辩证法”无非就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反映”^④。

那么,什么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的“现实世界”呢?《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处于其实际生活过程中的人,也就是“处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⑤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历史科学的目的则是“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⑦与它之前的思辨哲学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⑧——当然,这种真正实证的科学的逻辑线索无非就是在《资本论》中得到经典展示的、从对具体事物的经验开始的“概念辩证法”。

把这些论述综合起来,就能发现,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存在,无非就是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与作为该过程前提和产物的自然-历史世界。用恩格斯的上述引文概括,哲学所面向的存在就是现实世界及其辩证的现实运动过程。与此相应,哲学的使命无非就是从经验出发,以概念的逻辑揭示反映现实生活。现实生活的过程、主体、产物的总和就是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宣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19 页。

② 同上书,第 226 页。

③ 同上书,第 238 页。

④ 同上书,第 239 页。

⑤⑦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1 页。

⑥ 同上书,第 30 页。

⑨ 同上书,第 21 页。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与形形色色的哲学主张不断斗争的过程中,老黑格尔即已明确指出:“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我们对于这种内容的最初意识便叫做经验。……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①海德格尔正确地观察到,黑格尔的“现实”概念就是他对存在的领会。关于现实的哲学也就是关于存在的哲学。^②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哲学是扬弃或者说倒转黑格尔哲学的结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经典著作就是以对黑格尔现实观的阐发与辩护开头的。马克思哲学批判性地吸收了黑格尔的现实观,用黑格尔自己的术语来说,颠倒了“思想”与“经验”的关系,把黑格尔那里作为纯思范畴的“现实性”概念倒转为通过经验呈现、思想抽象与具体概念概括的“现实生活”总体——现实世界及其活生生的存在历史。

回顾前贤的教导,可以更加准确地发现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症结所在。热衷于仿效海德格尔谈论存在意义或本体论问题的哲学家,大约是把“现实”、“存在”之类当作不折不扣的玄学概念加以思辨的。另一方面,关注“现实生活”或者“历史经验”的社会科学家,则拒绝承认这些同哲学有任何积极的关系,以典型的实证主义方式将处于其丰富统一性中的“现实”转化为“事实”,而后以社会科学特有的概念系统加以处理——既然现实只是个别事实的总和,那么社会科学主张的普遍“概念”就完全是头脑中的主观概念。用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话说,这就是割裂了概念-经验、理性-现实、思维-存在的统一体。

当代哲学的这个症结并不是孤立的,它可以上溯到现代中国哲学形成以来的若干特点。

使命感高于求知欲、对社会历史问题的实践激情压倒纯粹的思辨兴趣,这是启蒙哲学的基本特点。与欧洲启蒙运动相比,现代中国哲学所体现的这个特点甚至更为突出。继承笛卡尔与洛克的欧洲启蒙哲学仍将纯哲学作为社会历史学说的普遍化基础。它在本体论、自然哲学与认识论方面贡献良多,这为德国古典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以更完满宏大的体系超越启蒙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此相比,同样肩负反对传统、探索革命这一社会任务的现代中国哲学,在本体论及认识论方面的建树远远弱于社会历史理论,以致哲学史家把现

①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3页。

② 参见《海德格尔全集》,德文版第68卷,第10页。

代中国哲学争论的头号问题交给了历史观,而根本没有将本体论列入现代的“主要论争”之中。^①诚然,对学院派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理、气这些纯粹的哲学问题。由于时代的激发,这些构造体系的哲学家当然也以某种方式处理“古今中西之争”之类的社会历史问题。但在他们那里,这些问题同纯哲学问题是割裂的、断为两截的。也就是说,他们正处于“理性”与“现实”彼此割裂的环节。金岳霖、冯友兰等“专业哲学家”无法像德国古典哲学那样以一个统一融通的大体系把握逻辑、自然与社会问题。这既是他们哲学体系本身的缺陷,也意味着他们哲学观的深刻内在矛盾。

我们姑且以冯友兰的体系为例。冯先生有两个一以贯之的著名观点,一是:“哲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②另一则是,哲学不切实际,仅涉真际;对于实际(也就是现实世界)无所肯定,而对于真际(也就是理念世界)有所肯定。对“不存在而有”的“理”进行概念分析,这就是哲学的基本任务。^③这两个观点揭示了现代中国纯哲学体系深刻的内在矛盾。难道人生不是处于所谓实际之中吗?难道对人生的反思仅仅是对“人生”这个概念作逻辑分析吗?反思如果抽掉了对象的本质属性、抽掉了人生的实际性,还能是真实的反思吗?冯先生哲学观的矛盾其实是他哲学体系矛盾的表现。他既然割裂了理性与现实、有与存在、理智与直观,也就无法真正解决“理”与“气”这个纯粹的哲学问题。从形式逻辑“悟入”的冯友兰体系,是典型的前黑格尔形而上学体系。像这样割裂理性与现实的哲学体系,即使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思想”,那也是缺乏真正哲学基础的。

前人的缺陷不是必须简单抛弃的东西,它包含了进一步推进哲学的积极因素。“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的这个主张本身并没有割裂真际与实际、理性与现实。就其内涵而言,它是基本正确的。只不过我们应当立刻加以补充:所谓人生,应该指现实生活的历史总体;所谓系统,应该指反映现实生活总体的客观概念网络。这样,哲学就既能与无视现实的形而上学区别开来,也能同以孤立的主观概念割裂现实整体的诸社会科学区别开来。更重要的,在这样一个哲学观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统一冯友兰与冯契关于现代中国哲学使命的两种叙述,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使命开辟真正的进展方向。冯契所揭示的古今中西问题,在实质上就是现实生活的总问

① 参见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绪论第二节。

② 冯友兰:《新知言》,三联书店2007年版,绪论。

③ 参见冯友兰:《新理学》,三联书店2007年版;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章。

题。冯友兰所展现的体系式探索,就是对古今中西问题的哲学解决形态。换言之,我们主张,当代中国哲学的基本使命,无非是面对现实生活的历史总体,在哲学的层面更深地把握、解决“古今中西问题”。这既是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超越,也是对一般启蒙哲学的超越。真正的超越,才是对中国当代哲学事业开创时代的最好纪念。

四

古今中西问题仍然是中国社会与中国思想面临的最大问题。与前人不同的是,当代哲学既可以在存在哲学的更高层面估计、把握这个问题,也可以在具体环节上运用更丰富的思想经验推进这个问题。

上文说过,哲学研究所面对的思想实情是现实生活的历史总体,哲学则是对这样一个历史总体之现实存在的反思。那么,更确切地看,这样的现实生活历史总体又是什么呢?现实的存在哲学——真正的唯物主义哲学,也就是说,既不是唯心主义哲学,也不是唯物主义科学——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多方面倒转。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是跟在现实总体之后进行的“追思”。换言之,只有在历史终结之后,哲学才能开始。在这个意义上,绝对哲学就是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是回到概念形式中的绝对精神。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哲学的倒转在于:首先,将处于概念形式中的绝对精神意义上的黑格尔式“现实”倒转为能动的感性生活——实践——意义上的现实;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将跟在现实总体后面追思的、仅仅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倒转为可用于改造世界的、作为无产阶级“精神武器”的哲学。^①也就是说,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理解为精神的实现,而马克思主义则将精神理解为现实的世界历史的异化产物。现实生活的总体不是别的,就是被黑格尔理解为历史世界——例如,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等等——的民族精神之间的对立统一洪流。

黑格尔那里的民族精神或者历史世界也就是被当代哲学称为生活世界或生活方式的文明体系。在黑格尔那里,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的开端,而日耳曼世界,也就是基督教文明-普鲁士国家则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在这样一个体系中,黑格尔哲学本身被把握为近代西方文明的自我意识。这就是黑格尔对他的时代——这也意味着此前的历史总体——的总结。以此为历史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对祛除其唯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心主义概念形态的近代世界文明——综合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提法,这就是“日耳曼”的“世界”——的解释与改造。

以此为鉴,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古今中西问题”为基本线索的现代中国哲学所探索的一切无非是中华现代文明的社会建设与哲学自觉。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的努力,特别是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的倒转,都是当代中国哲学必须继承与发展的宝贵遗产。当代哲学的根本使命,是以新的哲学形态为处于当代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中华当代文明的建设与自觉提供理论上的解释与指导。为此,我们特提出几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战略要点,供哲学界、理论界同仁参考:

(1) 与前人仅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本位出发解决“古今中西问题”不同,我们要在世界历史的视域里把握、解释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世界历史是文明自觉重构的前提。没有世界历史意识前提的文明自觉难以避免地方主义或相对主义。

(2) 世界历史意识只能来源于哲学。要从现实生活出发展开世界历史的存在论前提。只有在更为坚实的哲学基础上展开对文明体系与文明自觉的探讨,才有可能在新的实践视域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超越现代中国哲学关于古今中西的基本论述。这里的关键是引入一种可以严格描述、阐释现实生活及其基本形式的新哲学。

(3) 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界对古今中西问题的解决有一个基本倾向,即割裂古今、混同中西。一方面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把西方思想的一些结论简单地套用到中国现实中去。这个倾向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造成了中国当代文明最深刻的认同危机;同时,也根本无法解释中华民族探索自己现代化道路的独特经验。我们主张,从已经形成、正在形成的现代中国基本经验出发,一方面对古代中国思想传统对现代化的意义予以积极的阐释与运用,另一方面区分中西文明系统的基本差异,以便在更深的层面会通两者,将中华传统现代重建的经验概念化、普世化,为反省人类世界的整个现代文明提供必要的理论框架。

(4) 在对中国古今文明、西方古今文明的哲学解释中,要注意各自传统的多样性。特别要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东西方在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上的新探索、新经验作出全面的理论回应。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中西哲学流派中都比较缺乏的。当前的世界文明格局以及中华文明的特质都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贤者明察秋毫之末,现实永远是哲学观察的生命源泉。只有在中国-世界的关联体中密切观察人类生活的变数,才可能作出超越前人的贡献。